

韩国学丛书

韓國學論文集

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专辑

2006

第十五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韩国学丛书

韩国学论文集

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专辑 2006

第十五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五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7.4

(韩国学丛书)

ISBN 978-7-80722-363-4

I. 韩… II. 北…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59117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25 $\frac{3}{4}$

字 数: 600千字

出版时间: 2007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金顺玉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李京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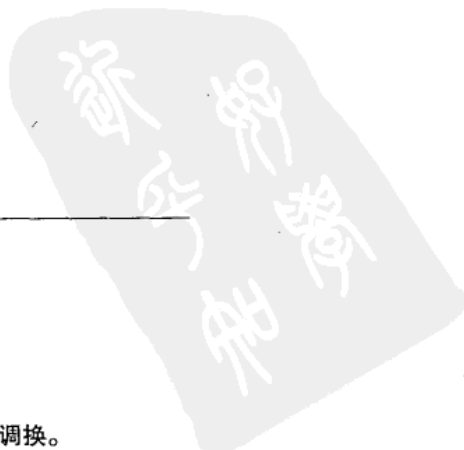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8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通方

副主编：葛振家 徐永燮 宋成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保云 巫宁耕 宋成有

沈定昌 严 绍 杨通方

徐永燮 徐 凯 韩振乾

葛振家 魏常海

目 录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经济	金柄珉 1
高丽前期对外关系与《高丽公案》	曹中屏 10
清代金氏常明史事考述	徐 凯 陈昱良 16
德川家康书契真伪辨	
——近世朝日关系个案研究之一	陈文寿 25
关于三韩山斗碑问题	姜相顺 36
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影响	孙卫国 40
从《旧韩国外交文书》看陈树棠对中朝贸易的作用	李德征 李劲军 48
统一新罗时期来韩的唐朝归化人	卞敬爱 57
清初朝鲜国王入朝说	李花子 62
明初铁岭卫设置与高丽关系述略	姜 阳 73
清代朝鲜使臣与医巫闾山	祁庆富 郭 平 80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始末	杨昭全 孙艳姝 88
朝鲜半岛新闻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英勇斗争	郑保勤 95
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的得与失	徐宪忠 102
论朝韩北南双方的半岛政策演变	巴殿君 106
姜敬爱和她的长篇小说《人间问题》	何镇华 112
17世纪后金(清)对朝鲜的侵略与郑斗卿的游侠诗	林浚哲 119
朝鲜申纬与《全唐近体选》	琴知雅 127
超越与升华：20世纪韩国作家的七夕文学创作	俞成云 136
韩国当代女作家小说叙事的文化思考	
——以《高丽亚那》刊载小说为中心	漆 瑗 146
韩国文化项目的产业扶植与政策方向	金英美 152
朝鲜民画的绘画特征研究	智顺任 162
中韩文化交流六题	金东珠 吴立丽 170
韩国IT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金美子 174
在华韩资企业遇到的文化冲突问题	崔志鹰 182

在合作和互补中取得双赢

——中国与朝鲜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分析	张 锋 188
中韩合作的新态势及其对策	宋 魁 193
构筑东北亚物流合作框架的几点思考	
——将辽沈经济区建设成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心的整体构思及路径选择	张东明 尹文华 200
韩国人的民族性	王林昌 210
韩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与明天	申玟丞 215
西博尔德与朝鲜语	陈 辉 222
韩国语新词的分类及形成原因	
——小议韩国语“族”系列新词	金迎喜 229
한중 문화교류	
——바람직한 방향에 관한 몇 가지 제안	권병현 236
朝鮮半島 周邊國의 戰略的 利害關係와 6者會談	权五允 246
중국의 항일전쟁 종결 후 南京市の 한국인 상황과 관리(1945.8-1946.3) ..	尹恩子 255
南北 價値體系의 異質化와 統一文化 形成의 方向	李瑞行 269
기업환경의 변화에 따른 한국 회사법의 변화와 발전	박은경 279
‘打’字的音韵变迁考	
——以宋朝孙穆所撰之《鸡林类事》为中心	陈泰夏 289
表音性 連綿語와 韓國語에서의 受容 樣態	林东锡 305
한국어 교육 현장에서의 경험적 방법에 의한 문화교육	김남길 317
한국학 전공자를 위한 한국 전통문화 교육 내용	이혜영 최수진 328
翻譯 漢字語 慣用表現과 한국 전통 문화	苗春梅 336
《九雲夢》의 東아시아적 幻夢構造와 思惟	丁奎福 343
창강 김택영의 세계관에 대하여	
——김택영의 사회관을 중심으로	박충록 349
한국소설에 나타난 분단인식의 변화 및 그 사회 문화적 요인에 대한 고찰 ..	金春仙 358
극도의 빈궁과 절망적 저항	
——최서해의 초기소설 고찰	신창순 366
韓國 神話의 時間과 空間 特性	
——膨脹과 收縮의 等價性	金炳旭 372
韓國의 傳統文化에서 《燕行錄》의 位相	金东锡 384
《景德傳燈錄》에 나타난 益州 長松山 馬禪師에 대하여	
——無相禪師와 馬祖道一의 師弟關係를 중심으로	卞麟锡 389
경기민요 희심곡의 敎義性	황순자 394
한류의 지속과 동아시아 문화산업의 협력방안	车信俊 401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经济

金柄珉

国际儒家论坛第二届会议——“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美国、巴西、瑞典以及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以“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儒学与东亚文化”、“儒学与文明对话”、“儒学及其传统”、“儒学与和谐社会”、“儒家思想的现代转换”等等为议题^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们认为，儒家人文精神具有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深刻内涵。它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特征，而且影响了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和崛起，以及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深入而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让人不能不思考一个深层的问题——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了问题探讨的具体化和深化，现就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作一些具体厘定和分析。

一、儒学与东北亚经济

东北亚文化不能等同于儒学文化，但儒学文化却是东北亚文化的重要核心。东北亚现代化发展与儒学文化的现代指导意义是密不可分的，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是一门包含着丰富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科学，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儒学中有丰富的与社会发展及现代化要求相通的内容，同时儒学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沉淀了大量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儒学与现代化的契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与现代化的契合；其二，儒学主体自觉的精神与现代化的契合；其三，儒学的人世精神、忧患意识与现代化契合；其四，儒学的家国意识与现代化的契合；其五，儒家重视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精神与现代化契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定儒学与现代化的矛盾。这突出表现在儒学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以及平等意识的缺乏。”^②

^① 光明日报，2005.12.27，⑨。

^② 方国根，罗本琦．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J]．现代哲学，2005。

以上这段分析,对东亚(包括东北亚)经济奇迹之“谜”与儒学文化的关系有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据港台学者金耀基的分析,世界各国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东亚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成功的探索,概括为两个派别:“一是从结构的观点来解释,特别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安排,此可称为‘结构论者’或‘制度论者’;另一是从文化的观点来解释,着眼于观念与价值,此可称之为‘文化论者’。在‘结构的解释’或‘制度的解释’中,金耀基认为,对东亚经济奇迹之谜所给的答案比较受到注意。”^①肯定东亚经济发展的“结构论者”或“制度论者”也是对马克斯·韦伯儒学文化对经济发展“障碍论”的否定。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可以不同意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结论,但却不能不接受韦伯多因素的‘弹性的解释体系’之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可以引导我们对现代儒家文化圈的经济的发展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且韦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非理性经济取向的分析不仅没有全错,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的洞识力是相当惊人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认同传统儒学没有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替代物的可能性因子这种观点。比如儒家的‘光宗耀祖’就十分类似于基督教的‘荣耀上帝’,因而不能排除其演化成类似于有利经济发展的‘天职’观念的可能性。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可能性之所以没有转变为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②其实“制度论者”(或“结构论者”)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有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有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那么什么样的政府是“强政府”?就东亚而言应该是儒家文化所塑造的“强政府”。儒家文化应对宏观的政府建设和宏观的经济指导发挥作用。“制度”、“结构”应在与宏观相对的微观方面发挥作用。

东北亚文化是对儒家文化与东北亚地区和国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作用于东北亚经济发展不可取代的“心灵和精神上的优势”。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既表现在对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又表现在对社会的规范、调控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的凝聚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内燃机,是社会常态的调控器,是凝聚社会的黏合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特别是每一历史时期的先进文化都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人们的心灵,像高高飘扬的旗帜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政党,都毫不例外地高度重视先进文化建设,都满腔热情地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推动社会进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文化可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所以说先进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凝聚力。可是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文化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即“阻碍论”。其实这应辩证分析。有的学者对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国家作

① 陈立旭. 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

② 陈立旭. 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

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84.

过客观的分析,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从地理位置上看,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部,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中朝在地理形势上属于“内陆外海”型。中国的北方是蒙古大草原和千里戈壁,戈壁滩以北是茂密阴冷的西伯利亚原始针叶林;西北是干燥的沙漠、盆地;在西南方,耸立着地球上最为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屋脊,它的东南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与地理相应,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最适合于生产、生活的温带,但是亚热带区域也不小,其最南部已伸入热带,而最北部又进入亚寒带。这样,农作物品种繁多,形成以水稻、小麦为主,玉米、高粱、谷子、甘薯等为辅的农产品格局,有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环境。由于封闭的地理格局、土地栽种的生产方式、山区交通的艰难和家庭化的活动方式,只能因地制宜地发展起农业经济,创造了世界最古老的“农业+伦理”的文明模式和“经济+实用”的文化精神。农业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知识,但极为有限,仅限于气候、季节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方面,而且变化很小。这样,天文学和历法便很快发展起来,天文学后来又主要演变成天象学,它转而以天象与人类事件之间联系而不是天体运行的规律为研究的对象;历法则直接是围绕农业制定的,即现在的“农历”。这种农业文明与儒学思想一拍即合,符合封建专制皇权的需要。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不仅自然环境大体相等,而且相互交流和文化往来频繁,由于朝鲜人的慕华与好学,把中国儒学文化全部传播到朝鲜半岛,并在那里根深叶茂,在当时的“天下”结构里,中国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华夏第一的国家,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自我形象。而得中国真传的朝鲜也以“小中华”自居。所以,当时的儒学文化又通过朝鲜广泛地传播到日本。儒学思想之所以在东北亚广泛传播总有其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先生在论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负作用时,还充分肯定其进步性,他说孔孟一些教义“在当时却合乎人民认识水平或具有进步意义”^①其实潘家铮先生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历史的科学的认定。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已历史地显示出儒学文化的引领作用,这就是当时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而儒学在以后被证明是不正确或有害的,如“天不变道亦不变”,追求“尧舜之治”,轻视和贬低工商、反对竞争等等,这些恰恰是历史的局限性,而历史的局限性也正说明儒学在当时的实事求是。因为一种思想越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适应是错误的,这不恰恰证明真理是在不断发展的道理吗。可以想象,因为在当时中国地理自然环境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发展商业,也不需要搞竞争,唯独求社会稳定,追求传说中的“尧舜之治”,这些应该说符合当时历史认识的,如果让儒学思想完全符合今天的现实,那在当时就是荒谬可笑的天方夜谭。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对儒学文化的扬弃和不断刷新,这是对儒学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儒学能在朝鲜半岛上传播,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枝盛叶茂以至根深蒂固,这本身就是对儒学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儒学还从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儒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直在东北亚发扬光大。正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儒家文化跨越民族地区和地域的界线,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朱子学对

^① 潘家铮. 正视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负作用 [N]. 光明日报, 2002. 5. 17. B1.

朝鲜半岛的影响甚至不逊于其在中国本土的影响。15世纪,朱子学成为朝鲜的统治理念。16世纪中叶,著名的儒学学者李愧(退溪)、李珥(栗谷)等发展了朝鲜的朱子学。朱子学还通过‘退溪学’对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天仍有一部分人尊重‘朱子家礼’,崇尚朱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人生、价值观。江户幕府时代,日本的朱子学成为‘官学’而纳入了学校教育,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儒学,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一些武士与官员以自己的儒家修养为骄傲。”^①当然,在朝鲜、在韩国、在日本的儒学不等于原本的中国儒学,其中的差异大部分是对儒学的丰富和发展,有人研究朝鲜现代化起步慢归罪于儒学,有人研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是别离了儒学,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有人研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大谈是日本受儒学影响较少,接受西方新文化较多的结果。总之,千方百计找根据去证明儒学阻碍社会进步,障碍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其实,这些很难得到历史的支持,也不符合客观发展的实际。因为儒学在东北亚三国表现不同是各国不同国情所致。

二、儒学文化与时俱进是东北亚经济的助推器

韩国在历史上是高扬儒学思想的国家。韩国接受儒学完全是站在文化普遍主义的观点之下,把孔子、朱子看成是全人类的圣人,把他们的学说看成是全人类的文化,他们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层面,在普遍意义上关注天、理、仁、义等人类的终极道德目标。向往“君为尧舜,民为三朝之民三”的理想社会。正像韩国学者黄炳泰在《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把中国学者朱子的虔信与忠诚,看作是道德律令,对朱子理学这一正统的宗教性敬畏超过了对本国的忠诚和情感……也因此使儒学成为一个真正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文化。”^②如今,在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中的中国已找不到名副其实的儒学整体风貌时,“在韩国却孔庙香火未断,还大有东山再起之势;设立于朝鲜太祖八年(1398年)的成均馆,今天仍在首尔(汉城)保持着当年的旧风貌;奉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宋朝六贤、东国十八贤牌位的大成殿、古代教育儒生的明伦堂、东西养贤斋、尊经阁、祭器库等,至今仍被保存和使用着。以儒学教育为建校精神的成均馆大学,每年培养一百多名专门人才,并以成均馆为中心,全国各地设有三百三十多处乡校和一百多座书院,开展儒学教育及祭祀活动。”^③韩国近些年来仍然大兴儒学文化,各地青年成立儒道会、女性儒道会、儒教学生会等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儒教活动,在1994年发起组织国际儒学联合会,并由他们出任首届会长。2001年韩国国家电视台KBS1每星期五播放孔子的《论语》讲座,直至61讲,场内座无虚席,场外吸引了全国的男女老少。儒学在韩国已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成为凝聚社会的黏合

^①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编.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B.

^② [韩] 黄炳泰. 儒学与现代化[M]. 刘李胜、李民、孙尚扬译, 北京: 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 1995: 368.

^③ 潘畅和, 对日本儒教特征的再诠释[J]. 东疆学刊, 2004: 14.

剂，成为社会常态的调控器，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韩国人早已剔除了儒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的东西，并与时俱进，吸取其与时代相适用的思想，用之于指导社会实践，韩国人用大“和”思想，兼容并蓄东西方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科技文化、管理制度、市场科学等，弘扬儒家仁爱、大同、中庸思想，坚持“天人合一”理念，以及对外的“阳光政策”等等，在韩国，人们都有无处不和谐的感受。正像我们的驻韩记者所感受的那样，在韩国“小河见证和谐”，“政府倡导和谐”，“小事反映和谐”^①。在韩国，儒学文化既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又转换成构建社会的方法和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手段。把儒家文化作为思想方法论，也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体现。把儒学文化的普遍意义结合本国国情的具体实践转换成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繁荣经济的方法、政策和手段。与时俱进的儒学文化可以说是韩国发展的目的，同时又是韩国发展的手段。

日本与韩国均属于儒教国家。在日本江户幕府时代，日本的朱子学成为“官学”而纳入了学校教育，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儒学，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一些武士与官员以自己的儒家修养为骄傲。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尊重“朱子家礼”，崇尚朱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人生、价值观。日本、中国、韩国同样都是儒学文化圈的国家，为什么韩国、日本在近代都能很快发展起来，特别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发展更加迅猛，摊开日本史册，1868年幕府被推翻，建立新国家，这种政治、社会的巨大变化被称为“明治维新”。明治新政府建立，将权力归于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策，并兼容了儒学与西学，制定了积极同欧美交往，向欧美学习，从而逐步实现近代化的方针。因而有的学者就提出日本是放弃儒学学习西学而发展起来的。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儒学抑止社会近代化，是西学推动日本走上了近代化，这种说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从直接原因看是西学推动所致，但从深层原因则不然。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大和民族之称，日本也讲究儒学的“和”、“仁”、“忠”、“教”，日本明治维新是“合和”了东西方文化，所谓“抑儒学”并不是放弃儒学，而是在儒学基础上兼容西学，其实质是儒学“和而不同”思想的发扬光大。由于日本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养成了其独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格，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日本民族就有客观认识的李大钊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武士道”与“大和魂”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有现在的地位，全靠这种精神，这是一种“行侠好义的精神，扶弱摧强的精神，为公家牺牲个人的精神”^②。李大钊还认为，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明，善于调和东西文化。李大钊指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③但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儒学兼容西学，将东西方文化互补，引领日本社会迅速走上了近代化，日本的强大，使日本膨胀起来，开始残暴的对外扩张，侵

① 霍小光. 在韩国感受和谐 [N]. 参考消息, 2005. 11. 17 (13).

② 李大钊全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

③ 李大钊全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

占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日本背离儒学文化的“和”的目的，而把“和”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口号，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丧失理智，进行的是残暴的侵略战争，烧杀掠夺东亚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当日本战败，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其罪责是：“（一）对和平的犯罪，即违反国际条约策划（包括共同策划）、准备、发动、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二）对人道的犯罪，即战争中（包括战前）对一般居民的杀戮、歼灭等非人道的行为或出于政治的、人种的、宗教的原因对一般居民的迫害的罪行；（三）通常的战争犯罪，即战斗人员或非战斗人员对交战国进行的一定的行为。”^{①(186)}在“通常的战争犯罪”之外，这次审判增加了“对人道的犯罪”和“对和平的犯罪”两条新原则，这是为了使国际审判能够追究国家指导者的刑事责任。1948年11月，判决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人死刑，判决南次郎等16人为终身监禁。致使日本赔礼谢罪。日本战败后制定的宪法强调“和平宪法”的特征，规定国民“拥有主权，放弃战争，扩大基本人权的保障”^{②(178)}，这使日本人能回归到儒学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上来。

日本战败后的改革，“确实是向着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方向转变的关键。”^{③(179)}日本战后的转变与日本在儒学基础上兼容西学的不断发展中，使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特别冷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迅速加强，彼此互动为重要贸易伙伴。目前，大约有1.8万家日本企业与中国有合作关系。2001年至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70%，这为日本经济复苏带来了强劲动力。同时日本也于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但经济和人员往来的加强并没有带来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加深，两国政府和民间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日益突出。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后，中日之间的相互争论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目前双方围绕着历史、安全、台湾、钓鱼岛、东海、能源、‘入常’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争吵不断，两国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④日本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共同的繁荣，而是要在亚洲当霸主，将中日关系的“友好”模式变成“普通国家”模式，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日自卫队欲求“名副其实”。特别在军事上，日美联手将NMD推到中国跟前，日本拟视“台海战争”为本土战事，修改周边事态法案，与美联手，确保美军畅行无阻。日本制造这种周边势态，完全背离了战败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从回归儒学和谐文化的正确轨道上又偏离出去了。日本的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是以儒学为基础兼容西学而引领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如果日本把儒学文化作为权宜之计，作为手段，而不把儒学精髓作为指导的宗旨，那么，即使经济发展得再快也是暂时的。离开和谐的周边环境，经

①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编.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B.

②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编.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B.

③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编.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B.

④ 魏克威.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的新作——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66.

济是无法发展的，维护人权，强国富民也都成了空话。只有沿着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文化传统，弘扬儒家和谐文化。那么，对日本、韩国和对其他周边国家发展都有利。韩国至今一直践行儒家和谐理念，深得亚洲各国的敬佩，也促使韩国经济持续发展。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先生说：“当今世界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斗，一条路是和。斗则冤冤相报，恨上加恨，永无宁日；和则彼此理解，互相学习，渐臻和谐。中国人历来相信‘和为贵’，‘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冤家宜解不宜结’。当然如果有人存心欺负你，中国人的答复是‘迎接你的有猎枪’。”在13世纪波斯诗人有首诗：“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躯体，最初都来自于共同的精髓，如果时光用痛苦折磨一条手臂，那么另一条手臂也无法安然休息。”^①当然，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现在处于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应该先采取主动行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走极端，无论哪方，一走极端，必生灾祸。有人说中国要统治世界，那是大笑话，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当时中国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当时中国有军事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但是中国没有统治世界。中国古代《礼记·中庸》说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是至理名言。“原则”与“神圣”固然庄严，但都大不过老百姓的福祉，以民为本，唯此为大。日本文化是东西方结合的文化，东方文化都有和谐理念，西方文化同样也讲究“和谐”。西方有比孔子更早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的学说通过柏拉图学和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发展成毕达哥拉斯主义，强调和谐与秩序、友谊、谦逊等德行。要创新文化不能复古，但可以继承传统遗产。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合作是在人类社会分工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职业团体整合，有人称之为“伙伴关系的法则”。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存在着顾全“公益”，反对追求“既得利益”。^②“和谐”是东西方相通的文化，也是东北亚文化的基因。日本的“大和魂”应讲究和谐之魂，如果搞军国主义，用武力侵略别国，即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都是带着刺刀的血淋淋的“和谐”，恰恰从本质上背叛了和谐之魂，这种文化意识与日本及周边国家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是应该被历史摒弃的文化。2005年11月20日托德·克罗韦尔在香港《亚洲时报》撰文题为“儒家思想的复兴”文中指出：“毫无疑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遵循了自律、社会和谐、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重视教育等儒家基本教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儒教前所未有的兴趣，而且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③只有坚持“和谐”理念，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这样才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才是日本等所有东亚各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本源所在。

① 詹得雄. 二〇〇五年的思考 [N]. 参考消息, 2005. 12. 29 (14—15).

② [新加坡] 谭中. 以和谐主义制服冲突主义 [N]. 联合早报, 2005. 11. 26.

③ 托德·克罗韦尔. 儒家思想的复兴. 2005. 11. 26.

三、“以人为本”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资本

中国儒学文化深层中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而日本、韩国是把儒学与本国不同地域、不同国情、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结合而成为日本文化、韩国文化。他们把儒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也正是为满足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的文化需求，也恰恰为适应本国人民的文化需求才进入到各自的不同结合点中，形成具有其本国特色的文化，但他们的文化基因都具有儒家文化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特征。在韩国，自古以来主流文化就是儒学“以人为本”思想，认为“‘仁者人也，二人为仁’，因此，仁不是别的，就是父子、君臣、夫妇等双方竭尽自己的本分。在这种意义上父子、君臣、夫妇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各尽职责的关系，而且‘事亲事君，皆治人也’。‘天子者，众推之而成者也’，‘牧为民有乎，民为牧生乎，……牧为民有也’。‘使一国而为两班，即通一国而无两班矣’”^①。这就从根本上尊重民生、人权，否定身份的制度。韩国从追求民生、人权和自由民主，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还有，日本从根上说是最早接受儒学的国家，现代思想家李大钊指出，“日本者，吾中华之产儿也。考其立国千年之历史，一切文化制度莫非传袭上国者。是则尔岛自开国以来，吾华无一日不负教训诱导之责”。^{②(442)}这里虽有一丝大国主义的意识隐含其中，但是中国儒学文化对日文化的深刻影响，这在历史上是有共识的。以仁者爱人的思想，教训诱导成仁也是日本历史的事实。日本战败后所制订的和平宪法，最大特点是：“国民拥有主权，放弃战争，扩大基本人权的保障。”^{③(178)}这恰恰是回归到日本儒学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上来。在西方国家讲究“人权保障”，在东方国家讲究“以人为本”。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确信的那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④。在人类追求人的自由发展过程中，从文化视点出发“单数的文化(culture)逐渐为复数的文化(cultures)所取代是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研究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意味着‘我’与‘他者’的并存。这也意味着文化的不同并不是一些人与另一些人拥有的文化的量的多少和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我’与‘他者’的文化类型差别与价值区隔的问题”^⑤。当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并且用“我”来称呼，就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其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形式和他接受世界的基本形式。当复数形式的文化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与“他者”的不同，而且还意味着人们同时意识到“我”与“他者”之间某种联系的存在。这后一点是更有意义的。正像有的

① 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331—332．

② 李大钊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

③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与教师共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B．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273．

⑤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

学者认为，“文化复数概念的广为接受，最具现实重要意义的是：想要将一些人置于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将另一些人置于较低级的一端，从而将人类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划分为先进、落后的做法没有了多少立足之地。”^① 文化是人创造的，坚持“以人为本”；文化又塑造了人，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生存方式。现代文化，“一方面向着拉平化、平衡化，在相同的条件下，通过把最偏远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建立各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圈子；另一方面，旨在强调最为个人的东西，旨在培养个人的自主。”^② 这两种方向都由货币经济来支撑，最终，货币经济的支撑性作用越来越大，而使得它差不多由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坚持“以人为本”而人又可转化为发展经济的资本。

人在社会群体中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也是一个最大的单位，不管是经济社会、政治文明社会、文化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国家说到底都是人民的国家。正像伟人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东北亚中日韩朝都是人民的国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东北亚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以人为本，实现睦邻、安邻、富邻，让东北亚人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也就是东北亚人追求的存在方式。

（作者系延边大学校长）

①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

②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高丽前期对外关系与《高丽公案》

曹中屏

高丽王朝自太祖王建于公元918年立国，到恭让王于1392年让位，其间共经历34代，历时475年。以1126年发生李资谦叛乱为标志，其历史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东北亚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高丽与中国之中原王朝北宋的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以至于出现所谓“高丽公案”。然朝鲜朝末叶，其实学派巨将燕岩朴趾源则称中国“当时士大夫，不谅高丽之本心，反疑强邻之间谍”，“谓此非高丽公案，乃高丽冤案”^①。

高丽建国初期，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以甄萱为首的后百济（892—935年）割据半岛西南，并以完山州（全州）为根据地，继续不断蚕食新罗仅存的庆尚道一带的领土，威胁着高丽新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建国后的大约18年间，为争夺北起古昌（安东）南至洛东江以西康州（晋州）一线新罗的土地，高丽与后百济时有战争。高丽太祖十三年（930年），后百济在古昌战役中遭到重创。此后，高丽在半岛取得了绝对优势。1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处于五代十国时期。916年，契丹族，在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建国。此后，虽然契丹人的势力日益显现，并呈现称霸东北亚的趋势。但一个时期里，那里尚无任何国际秩序可言，这为高丽向北方扩张领土提供了相当的空间。

建国伊始，为实现高丽“先操鸡、后搏鸭”的立国宗旨，太祖确立了经营平壤“以固藩屏”与亲中国、仇契丹的战略方针。向北方扩张领土的第一步是把平壤建成防护“北界”的堡垒。太祖元年九月，王建决定升“荒废”已久的古都平壤为大都护府，“徙盐、白、黄、海、凤诸州民”和首都开城部分官吏“父子及诸县良家子弟”予以充实。同时，又在大同江以北设立了通德镇（肃川）、定水镇（永柔）、安水镇（价州）、大安州（慈州）、刚德镇（成州）、通海镇（咸从）州镇等要塞，加强北方边邑的防卫和安全。

一个时期，处理与渤海国难民及女真人的关系是关乎高丽北方安全的大问题。公元

^① 朴趾源·亡羊录//载燕岩选集，平壤：新朝鲜社，1955：172—173.

10世纪初，靺鞨所建渤海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部分王族和官僚、将军南走高丽。926年，契丹攻陷忽汗城，渤海国亡，亡人“来奔者相继”。对此，高丽采取欢迎鼓励的政策。于是，原位于黑龙江以北、与渤海对立而隶属于唐黑水府的黑水靺鞨，开始向朝鲜半岛移动。黑水靺鞨是女真人中较发达的一部，高丽大体上采取吸收同化政策，而视游走于半岛北部的“北藩之人，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今虽服侍，向背无常”。931年，太祖在巡幸西京州镇时，昭示有司“令所过州镇，筑馆城外待之”。

高丽以契丹“背盟殄灭”曾与其“连和”的渤海国为无道，“不足远结为邻”，拒绝与契丹人交往。太祖二十五年（942年）冬，契丹遣使以50匹骆驼来开城交往，结果高丽以“流其使30人于海岛、系囊驼万夫桥下皆饿死”的极端方式回答契丹。与此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五代的朝贡关系。高丽太祖六年（923年）夏六月，太祖遣使后梁与后唐。这种亲中国、拒契丹“土人”的政策，被太祖作为高丽王室必须遵照的“龟鉴”。933年，高丽接受后唐册封，除己天授年号，行后唐年号。这样，高丽“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太祖遗训规定的对契丹强硬政策，因契丹人势力的发展方向不在朝鲜半岛，10世纪60年代前都能得到贯彻。

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叛唐，契丹割占燕云十六州，虽隔断了高丽与中原五代王朝的陆上交通，但在双方的努力下，高丽继续如初地保持了与后晋的关系。后不久，契丹军攻占开封，后晋（936—946年）亡。这时，改国号为辽的契丹，在华北义军的压力下，引兵北还。至是，契丹西南向与中原都于开封的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形成对峙状态。由于当时契丹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汉人的反抗和消化其占领的广大领土，朝鲜半岛北部成为政治上的真空地带。这样高丽得以游刃有余地通过由南部向北方移民和对生活在北方的女真人的威压与怀柔，在10世纪上半叶，将其西北的疆土扩张到清川江下游，其东北疆土达到了永兴地区。

二

公元960年，北宋（960—1127年）取代后周；979年，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结束，中国出现统一局面。于是，东北亚形成宋、丽、辽三足鼎立的格局。

北宋建立不久，宋建隆三年（962年），高丽王光宗遣使李兴祐如宋献方物，于次年冬改行宋年号。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间，丽使朝宋29次。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高丽遣金行成赴汴京入学国子监。自是至994年，几乎每年都遣使朝宋。这种紧密关系与当时东北亚的政局有关。当时，契丹在加紧征服境内女真人的过程中，把领土扩张到鸭绿江北岸，对高丽形成巨大压力。970年，原渤海国余党首领烈万华叛辽，在鸭绿府自立为安定国王。安定国地处丽辽之间，以临江为国都，以女真人为使与北宋联系。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乘亡北汉之势，决定“联丽制辽”进行“北伐”，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通告高丽。而高丽忙于大量吸收“来投”之渤海人和在北方拓土，对此反映冷淡。结果，高丽不仅丧失了一次与宋联盟抗辽的绝好机会，而且其对女真人的刚柔并济政策亦遭重创。成宗三年（984年），刑官御事李谦宜奉王命“城鸭绿江岸